

一本在哈佛大学圈内广为流传并引起激烈争论的书



一对哈佛学者
与世界第一学府
的真实故事

Expecting
Adam

哈佛女人

[美] Martha Beck 玛莎·贝克◆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I712.45
1166

[美] Martha Beck 玛莎·贝克♦著
王茜♦译

哈佛女人

中国发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佛女人：一对哈佛学者与世界第一学府的真实故事/(美)贝克著；王茜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6

ISBN 7-80087-619-5

I . 哈… II . ①贝… ②王… III . 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7436 号

Copyright © 2001 by MARTHA BECK.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ANFORD J. GREENBURGER ASSOCIATES(SJG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3 by CHINA DEVELOPMEN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2-6483

书 名：哈佛女人：一对哈佛学者与世界第一学府的真实故事

原 著 者：(美)玛莎·贝克

译 者：王茜

出版发 行：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赵登禹路金果胡同 8 号 100035)

标 准 书 号：ISBN 7-80087-619-5/Z·89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者：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1/32 880×1230mm

印 张：10.75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联 系 电 话：(010)66187126 66187127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请向发行部调换

作者手记

这不是一本小说,这意味着本书中所有真实事件都是严格按照事实叙述的,当然,我只是对其中涉及的人物撒了些赤裸裸的谎。请允许我解释。

在写作此书时,我做了谨慎的努力,严格按照事实报告第二次怀孕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首先,我之所以记下这些东西,是因为我想在纸上记录下我的这些经历的细节,这样我对这些事情的记忆就不会被时间扭曲。这对我尤为重要,因为我所记录的事情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些事件最后终于改变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不仅如此,我知道如果这本书真的得到出版,我会很快在我所有学术界的朋友和熟人之间成为“功名卓著”的人。如果他们中有任何人批评我夸张或胡说八道,我想我有绝对的把握证明这些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我曾经接受了大量训练,只记录“事实”。作为一名出身哈佛的社会学家,在学校的时候,如果我对事件的叙述草率、夸张或者没有根据,我都会受到猛烈的攻击(不是身体上的,但是也差得不远了)。这几年以来,我已经形成习惯,做详尽笔记,对面访录音,从别人的观察角度出发重新检验自己对事件的解释。写我的第一本书《转折点》之前,我花了上千个小时详细审阅每个数据,确保它

们的真实性。对这本书我也做了相同的工作。

在我写此书的过程中,为了补充我的记忆,我在怀孕的时候保存了大量日记。我在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我所有的想法和经历,包括一些重要对话的梗概——甚至常常是确切的词语。多年以来我一直提醒自己烧掉这些日记,直到最后我意识到这么干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每个正常的人是宁愿被烧焦也不愿意读这些东西的。所以这些日记得以幸存,成了这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通过这些日记和“看得见的事情”(我在本书中做了解释)我对约翰的经历也获得了部分了解,但是我强迫他做了回忆,并对事实做了检验,从而使我对他的经历的叙述的公正和精确。手稿完成后,我找来书中涉及的朋友们,以确保我的记忆与他们的记忆是一致的。

结果我发现,我对精确的要求成了一个问题。我发现当我用纪实的手法写真人真事时,我很可能会使他们产生不快,往往会泄漏一些关于他们的事,而这些事在我看来是无伤大雅的。因此,我改变了本书中一些人的名字和明显的特征,在文章中我已经指明了这些伪装。我的目的是保护这些亲密朋友的隐私,以及那些言辞坦率(对此我未作改动)的人的隐私。因此,你手中的这本书叙述了很多普通的、平凡的故事,故事中涉及的人即使被警察作为嫌疑犯抓起来你也无法挑得出来;其中一些真的很离奇的、让人难以置信的东西,我完全是按照事实记录的。也就是说,有些东西越让人难以置信,就越有可能是真的。我越想下去,就越觉得这似乎才是生活中的普遍道理。

玛莎·贝克

致 谢

想想通过那么多人的帮助我才能够写这本书，我真的感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回忆录总是有这样的问题：有太多的人需要感谢，那些帮助我度过这些经历的人，以及那些帮助我记录这些经历的人。

有几个人同时属于这两类。我永远不能对我的丈夫，约翰·贝克，完整地表达我的爱意和感激，他对于我来说就像呼吸一样不可或缺，在这整件该死的事情发生的过程中，他一直陪伴在我左右。凯蒂·贝克，虽然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她只有 18 个月大，现在也只有 12 岁，但是从我怀孕时开始一直到我写这本书，她一直在尽最大努力给我关怀。（我希望永远不要有哪位治疗师某一天会帮助凯蒂处理她童年时的精神创伤，并将此作为一份预先写好的忏悔。）西贝尔·约瑟斯顿，这位伟大的作家，忠实的朋友，伪装得极不成功的仁慈的天使，我也要对她表达我的感激，还有她的丈夫查尔斯·伊努耶。我的表姐丽迪亚·尼布里在我生命最暗淡的时候为我带来希望和快乐。她和她的姐姐西尔维亚·尼布里的爱意和支持一直让我感动。

其他在我怀着亚当时救过我命的人包括我的父母休和费里斯·尼布里，约翰的父母杰·贝克和他的已故的妻子菲。我的姐妹们

——克里斯蒂娜·门塞克，丽贝卡·尼布里和兹纳·彼得森——与我的兄弟保罗和他的妻子布罗尼娅为我提供了无尽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帮助。在哈佛方面，很多朋友都给了约翰和我很多友善的帮助，比如安妮和肯尼斯·莫里尔，戴安和郎特·普里切特，还有其他研究生院的朋友。有很多教职员都非常体贴我们支持我们，包括威尔·莱曼、安妮迈特·索伦森博士、来诺尔·维兹曼博士、阿格·索伦森教授、俄兹拉·沃格尔教授和约翰·考特教授。社会学系的贝弗·多罕给了我很多时间和富于同情心的建议。在我的健康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在得知了亚当的诊断结果之后，多亏瓦尔特·阿梅斯博士和马克·夫勒为约翰的事业提供了关键的帮助。他们可能从来都不知道我对他们多么感激。

在度过这段日子并开始记录它之后，我的身边又出现了另外一些人为我提供帮助。我的第三个孩子，丽兹，首当其冲。自从亚当第一个发现了怎样让她笑之后——那时她的脑袋还那么小，我能把它放在手心里——她就一直是他最好的朋友。像凯蒂和亚当一样，她原谅了我作为家长的很多缺点，为我带来了巨大的欢乐。除了约翰以外，露兹·凯尔派克博士一直说服我我的故事是值得一写的。她的爱和专家意见让我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曾和我一起旅行的人康尼、安妮、奥尔加、玛西、美兰尼、派姆和林达都曾经鼓励我的写作，鼓励我的生活，我很崇拜她们。西丽亚·阿伦和帕特里西亚·郝兰帮助我理解自己的经历，这样我就可以较为清晰地叙述它们。我们刚刚搬到凤凰城之后唐·斯万森给了我不可替代的友谊。安妮特·罗格斯是我第一位(非正式的)编辑。她的耐心和建设性意见让我们成了莫逆之交。

本书第一版完成之后，苏珊·沙尔曼，我的代理人读了一遍。她给了我反馈、鼓励、建议，付出大量心血使这本书得以出版——

而且,与她聊天也很有趣。对于“时代出版社”中很多帮助这本书出版的人我都要深表谢意:约翰·兰姆保尔、彼得·伯恩斯坦、玛丽·贝兹·罗切尔、卡林·弗莱姆兹和南西·英格里斯,还有很多其他人。对白特斯·拉波珀特,我出色的编辑,表达我特别的爱意和感谢,她的智慧和敏感让这本书有了正确的方向,她的友谊给了我很大鼓舞。

最后,我想感谢卡林·格尔德斯,她总是那样充满智慧,那样富于同情心,她的远见卓识为我治愈了很多伤口,让很多梦想变为现实。看到这么多人被列在一页纸上真是让人不安。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想我要趴下哭一小会儿。

1

我飞奔回家，来看亚当。他还在他的婴儿床上睡着觉。他大概只有普通3岁孩子一半那么大，他才刚刚学会走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个清晰可辨的词语。我低下身去，捅捅他的肚子，他醒了，脸上带着他常有的欢快的露齿大笑……

这件事大约发生在亚当3岁的时候。’

当时我和一个以前几乎素不相识的女人坐在一间小公寓里，和她谈论着她的人生。为了叙述的方便，我称她罗斯太太当然这不是她的真名。那时候为了搜集我的博士论文的数据，我已经做了好几个月类似的采访。罗斯太太45岁左右，骨瘦如柴。她有美术史的硕士学位，却在一个小学里做看门人。我做着笔记，思索着这个女人的经历能对高雅艺术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问题说明什么，这时她突然停止了谈话。

屋子里出现了一瞬间的沉默。我抬起头来说道，“是吗？”我的语气显得和善而乐于帮忙，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口气足以使访问继续下去。但是罗斯太太的表现非常怪异。她本来是坐在一把直背的木椅子上的，双脚稳稳地放在地上，双手循规蹈矩地放在膝盖

上。现在她像一个婴儿一样全身蜷曲着，前臂夹在大腿和胸部之间，双目紧闭。

我警觉起来。“你还好吧？”我问道，尽量使自己听起来彬彬有礼而又不显得过分好奇。

罗斯太太向我摆摆手，“我不……太能……明白”她说。

我瞪着她。

罗斯太太一边说着，一边心不在焉地抚摸着一只鹦鹉。“所以我向上帝保证，我要永远一接到信息就传递出去。不管那是什么样的信息。”

“别开玩笑。”我说道，丝毫没有讽刺的意思。从我的回答中，你可以看出我这个人已经变了多少。4年以前我会毫不犹豫地对罗斯太太和她“天赐的礼物”不屑一顾。那时候我肯定地相信自己的智识，肯定地相信理智的至高无上，肯定地认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训练，我就能控制我自己的命运。那是亚当来到我的生活中之前的事了。如今4年已经过去了，现在亚当正在家里和临时保姆在一起，而我，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有多少东西是我必须要去学习的。所以我静静地坐着，等着罗斯太太继续说下去。而她也的确向我娓娓道来。

罗斯太太用一种足以刺穿钢铁的眼神瞥了我一眼，这一眼是要我不要对她的事指手画脚。

“或者不需要放松，”我说道。

“我们应该祈祷，”罗斯太太低语道。

“嗯，好吧。”我回答说。我的意思是，在那种情况下你又能怎么做呢？

所以罗斯太太和我都低下了头，我做了一次深呼吸，放松了仅仅一秒钟，然后她的头像一个沥青分送器一样突然抬了起来，她说

道，“好了，你不再拒绝沟通了。那是你的儿子。”

“我的儿子？”即使在这之前我已经经历过那么多事，她的话还是让我很吃惊。我一直在希望那消息来自我的守护天使，或者某个对我的职业感兴趣的远祖。

“你有一个介于两个世界之间的儿子，”罗斯太太说道。

“那么，”我对罗斯太太说，“可能我确实有个儿子……嗯……好像是这样的。”

她看了我一眼，让我觉得无言以对。“你确实有的，”她直截了当地说，“而且他想要我给你捎个口信。”那只鹦鹉轻柔地啄着她的耳朵。

那个时候我的全身好像充溢着一股奇怪的电流。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对这种感觉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它每次出现的时候还是让我很惊奇。我闭口不言。

罗斯太太又一次闭上了她的眼睛，这次是轻轻地闭上。“他说你不应该那么忧愁。他说如果你把自己的心灵开放，不把自己这样封闭起来，你受到的伤害永远也不会更多。”

她睁开眼睛，轻抚着鹦鹉的头，微笑着。

“就是这个？”我说。

罗斯太太点点头，微笑着。

我并没有回报给她一个微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她耸耸肩。“这可把我难倒了。”

“哎，来吧，”我请求道，“一定还有些别的。向问他吧。”这不是我在哈佛教导给我的行为方式。

“我不问问题，”她说，“我只是传递信息。就像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至于那消息是什么意思可不关我的事。”

这就是所有她必须告诉我的话了。

我继续痛苦地假装我还是在进行一个采访,与她交谈了一会儿,然后我飞奔回家,来看亚当。他还在他的婴儿床上睡着觉。他大概只有普通3岁孩子一半那么大,他才刚刚学会走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个清晰可辨的词语。我低下身去,捅捅他的肚子,他醒了,脸上带着他常有的欢快的露齿大笑。

他的笑容变得更大了。仅此而已。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所以现在我还是在想到底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在想罗斯太太是不是真的为我3岁的孩子传递信息,在想她到底想告诉我什么。自从亚当来临之后,我对很多东西都开始怀疑起来。对于所有伴随着他进入我的生活的奇怪的美丽的和可怕的事我都感到惊异和疑惑。我的丈夫,约翰,了解我的感觉——事实上分享着这个感觉,因为他的生活也一样,在我们等待亚当的时候被改变了。但是当我不和约翰说话的时候,我学会了不对别人吐露半点实情。我学会了忽略发生在我生活中的种种奇迹,假装它们都不存在,并且为了被信任而撒谎。一句话,我把自己封闭起来。

这么做不容易。当你的一个采访对象居然变成了一位鹦鹉夫人的时候,什么都不说是很难的。那种奇特的感觉,那种好奇,那种惊奇和怀疑不停地向外涌,渴求交流,需要向别人公布,需要别人的理解。在很多场合,我努力尝试着与别人谈起亚当,而不表现出事实上我笃信每一件发生在我头上的事。我写这本书已经有两次了,都是作为一本小说来写的,我是这么说的:“这是两位哈佛学者的故事,他们生活在重压之下,却在妊娠期间发现他们未出生的儿子是一个弱智儿。让他们自己感到惊奇、也让大学圈子里的人感到惊恐和不安的是,他们忽略了现有的完善手段,无视人工流

产的充分理由和大好机会，没有进行人工流产。他们决定让他们的孩子出生。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自己才是“新生”的婴儿，降生在一个奇迹如家常便饭般的新世界里。哈佛教授是迟缓的学习者，而弱智儿是他们的导师。”

你看，我可以以小说作为幌子叙述这个故事，而不把自己置于来自怀疑论者、科学家和有智之士的危险之中。“虚构的！”我会肯定地告诉他们。“纯属虚构！没有半句真话！”然后他们都会走开，让我一人单独呆着。或许会有一些坚定的人乐意相信我的话，那么我就可以也把我的心灵向他们安全地敞开。

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些我最尊敬的编辑、代理人和作者总是在读了我的“小说”之后回来找我，问我同样的一个问题：“对不起，但是这里面有多少虚构的成分？”我会犹豫一下，然后承认除了把约翰和我描写得特别好看之外，我没有虚构任何东西。那都是真实的，我会说。然后我会向我的椅子上陷进去5到6英寸，等着他们把保安人员叫来。

到目前为止，这还没有发生过。自从罗斯太太仰着头，靠着她的鹦鹉，向我传递亚当的口信的事发生以来，已经有5个年头了。在这期间和我要好的人们也不停地重复着他的建议。敞开你的心灵，他们说，那比把你自己的封闭起来要好受得多。

但我对这话非常不以为然。我害怕自己被卷入有关流产、基因工程和医学道德的激烈争论之中。一想到我会被归类于流产反对者我就觉得很担忧，而如果我竟然胆敢宣称自己曾经在赛都拿上空的云端里见过天使并亲吻过他，后果就更不堪设想。我犹豫着向自己理性主义者的名誉挥手告别。然而，故事不会停止，它仍然逐渐显露，而且它仍然不停地要求我公布、公布。我好像已经抗拒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希望它能慢慢消失。但是它没有。

2

或许所有这些会让你以为，约翰和我觉得哈佛是个怡人的地方。哎，这样你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我想我在哈佛里碰到过的所有人都认为这里让人憎恶。对我来说好像所有的人都在焦虑地从一个成果匆忙赶向另一个成果，他们经常越过自己的肩膀，向背后投去警觉的目光，他们从来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已经完全摆脱了失败的困扰……

约翰和我是什么时候对我们的生活失去控制的？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有分歧。他认为那是在新汉普郡发生车祸的时候。我说是在那次车祸两个星期之前，我怀上亚当的时候。不管怎么样，那是1987年9月的某个时候，在我们的家庭史上，从那时起我们的生活就“全都见鬼去了”。

我们在东京度过了夏天，刚刚回到剑桥。在东京约翰一直在为一篇有关日本雇佣体制的博士论文做研究。因为时差的关系我们感到头晕目眩，对穿越14个时区的成年人来说这已经够糟糕的了，而如果你还带着一个婴儿那简直就是一次无法想象的挣扎历程。我们18个月大的女儿，凯蒂，还是按照日本的时间作息，在波士顿的晚上她还在玩耍和牙牙学语，而约翰和我轮流尝试着睡一

觉。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凯蒂合上了她令人发狂般明亮的眼睛，而我们又得拖着憔悴而虚弱的身躯，处理重返哈佛的一摊事儿。

又是这样。

关于哈佛你必须得知道一些事。首先，约翰和我都是在这里长大的。我说的不是童年。我是说我们所有成熟的想法和理想都是在那里培养起来的。至于我们的童年，我们是在犹他州的同一个小镇里度过的，那个州对常春藤联盟的任何成员都非常陌生。(有一次我的一个教授告诉我说他刚刚从我的故乡回来。我说，“哎，是吗？在哪儿？”他说，“爱荷华。”他没有开玩笑。)事实上，这本书标志着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承认我是一个可爱的蜂巢之州的孩子。哈佛的教育让我相信，承认这个事实就好像是承认自己有过精神病史，或者有在商店偷窃的历史。如果我告诉大家我是狼群养大的，我的荣誉会比现在好得多。

问题在于，在来到哈佛之前，约翰和我的生活都与这里的生活截然不同。约翰是在 18 岁的时候来到哈佛的，我比他晚了两年，在 1980 年到的，那时我 17 岁。其实我们在高中时就认识，但只是模模糊糊的；当我们彼此熟悉的时候，已经完全地、成功地哈佛化了。我们有很多共同点：过去在西部公立小学的见不得人的秘密，为追求成功而付出的不懈努力，以及对融入这个团体的渴望。我们玩命似的工作，选择最难读的课程，这样如果我们接到招生办公室的电话，说他们刚刚意识到他们搞错了，错误地接收了我们，我们也能有一个挣扎的机会，继续在这里上学。结果是，我们学术成绩卓越，并且就像上瘾似的一次又一次地在哈佛继续着我们的学业。在本科毕业之前，我们甚至已经申请硕博连读了。约翰继续他热爱的亚洲学研究，而我专注于性别的社会学研究。到 1987 年 9 月份的时候，我们有生之年 1/3 的时间都是在哈佛度过的，而这

种生活还远远没有结束。

或许所有这些会让你以为,约翰和我觉得哈佛是个怡人的地方。哎,这样你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我想我在哈佛里碰到过的所有人都认为这里让人憎恶。对我来说好像(虽然这很可能是主观臆断)所有的人都在焦虑地从一个成果匆忙赶向另一个成果,他们经常越过自己的肩膀,向背后投去警觉的目光,他们从来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已经完全摆脱了失败的困扰。对我来说,在这儿做学生是一件令人振奋的、激动人心的、甚至是能令人兴奋得发抖的事,但是伴随而来的还有无边的恐惧和悲惨。这好像是和一位学识渊博的、机智的名人一起吃午饭,他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弯身越过桌子,在我的嘴巴上打上一巴掌——狠狠地。这有趣吗?是的,很有趣。这令人振奋、受到启发吗?从很多方面来讲,是这样的。这令人愉快吗?我不那么认为。

所以,不管我们已经做过多少次学期注册,每次这堆琐碎的事情总让约翰和我战战兢兢,忧虑不安,这种心情让我们不由得互相呵斥,并且不小心打碎东西。当然,我们都不会在这种折磨下承认自己的困境,甚至不会向对方坦白。我们接受的训练让我们能够对此缄口不言。在哈佛,自信的外表是在这个社会生存的关键。没有它,你会像种群中受伤的动物,吸引着猎食者的注意,招来大多数伙伴的蔑视。(直到约翰在哈佛第4年的一学期期末的时候,我和约翰陷入爱河,我才能鼓起勇气告诉他我多么害怕失败。他也坦承有类似的感觉。这种交流足以把我们永远联系在一起。那比做爱还要亲密。)

3年前约翰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没有人会猜想他的自信曾经有过哪怕一刻的松懈。他表现出了无比的自我肯定,尽管他不仅要完成自己的学业(这本身就已经压力够大了)而且他还在尽力争